

本著作榮獲2002年中央研究院
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譯者 李宗義
校訂 黃庭康

校訂 黃庭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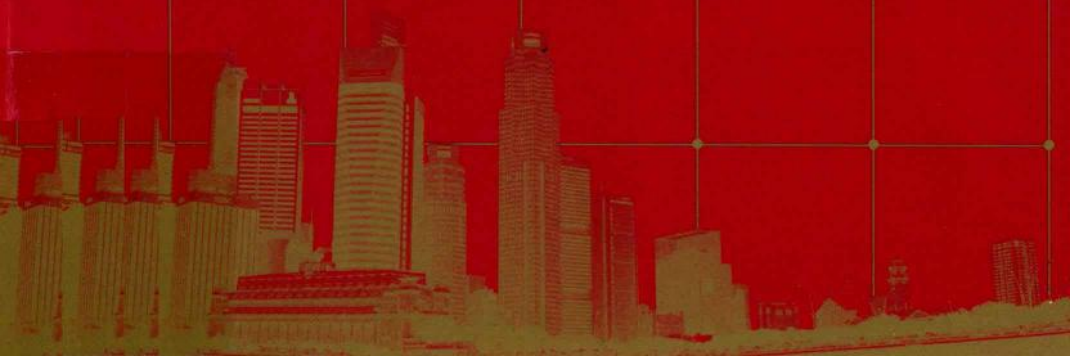
比較霸權



戰後新加坡及香港
的華文學校政治

HEGEMONIES COMPARED

State Formation and Chinese School Politics
in Postwa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本著作榮獲2002年
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
研究著作獎

譯者 黃庭康
李宗義

校訂

黃庭康

比較霸權

戰後新加坡及香港
的華文學校政治

HEGEMONIES COMPARED

State Formation and Chinese School Politics
in Postwa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Copyright©2002 Routledge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2008 Socio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Inc., par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比較霸權：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政治

黃庭康 (Ting-Hong Wong) 著；李宗義 譯

一版 - 台北市：群學，2008. 12

面：公分，含索引

譯自： *Hegemonies Compared: State Formation and Chinese School Politics in Postwa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ISBN 978-986-6525-04-9 (平裝)

1. 教育政治學 2. 華文學校 3. 比較教育 4. 新加坡
5. 香港特別行政區

520. 1857

97020048

比較霸權：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政治

(*Hegemonies Compared: State Formation and Chinese School Politics in Postwa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作 者：黃庭康 (Ting-Hong Wong)

譯 者：李宗義

校 訂：黃庭康

總編輯：劉鈴佑

編 輯：黃恩霖、呂環延

出版者：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61 號 7 樓 712 室

電話：(02) 2370-2123

傳真：(02) 2370-2232

網址：<http://socio.com.tw>

電郵：socialsp@seed.net.tw

郵政劃撥：19269524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封 面：黃偉鵬

電郵：weipeng.huang@gmail.com

印 刷：權森印刷事業社

電話：(02) 8221-2628

著作權所有 翻印必究

幾點說明

在本書中，「華文學校」是指理論上（supposedly）應該採用中文——包括中文國語（Mandarin）、粵語、或其他中國方言——作為主要教學媒介的學校。這類型學校在香港被稱為「中文學校」。在本書有關香港的章節中「華文學校」及「中文學校」兩名詞將被夾雜使用。

在香港有一類以英語為主要教學媒介，但絕大部分學生是華人的學校。它們都要求學生修讀「中國語文」，並大都有開設「中國歷史」及「中國文學」科。本書將按照香港的慣例將這類型學校稱為「英文學校」或「中英文學校」（Anglo-Chinese schools）。香港有另一類以英文教學的學校，它們的學生大都是外籍人士（例如殖民政府高級公務員、外資公司中高層人士）的子女，課程有異於本地學校。本書將稱它們為「英童學校」。

筆者希望關心教育問題以及對新加坡及香港歷史感興趣的人士亦能從本書獲益。倘若讀者因為缺乏社會學理論背景而在閱讀第二章時遇到困難，筆者建議他們暫時略過該章、直接進入歷史敘事的章節。

銘謝

很高興《比較霸權》中譯本在英文版出版六年後終於面世了。在過去六年不斷有朋友鼓勵我把這書翻譯，讓中文讀者也有機會閱讀這部探討兩個華人社會教育問題的作品。我明瞭《比較霸權》出版中譯本的意義，因為我認同台灣學術界強調要兼具「國際視野」與「本土關懷」的理念，並且相信讓研究著作同時具備外文及本土語文版本是實現這理想的重要條件。然而，身處現代學術體制、面對「出版或滅亡」的沈重壓力，維持穩定的學術產量、保障賴以謀生的一席之地已使人身心俱疲。此外，台灣的學術評鑑制度並不承認翻譯的價值。我的理性一直在勸我打消出版《比較霸權》中文版的念頭。

在這些不利因素下本書依然能夠面世，我著實要感謝譯者李宗義先生。宗義具備良好的中、英文能力及社會科學素養。更難得的是他不計較酬金的微薄以及我這挑剔的原作者對譯稿的諸多批評。我也要感謝劉璐娜小姐及鍾延麟先生，他們在翻譯工作的後期協助文字處理並對譯稿提出寶貴意見。此外，本書能順利出版，群學出版社實在功不可沒。在台灣經營社會科學學術性書籍基本上是無利可圖的，要是沒有像群學般具理念的出版社，很難想像《比較霸權》中文版可以面世。最後，我要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同仁致謝，我很幸運與他們共事，經常有機會向他們請教、彼此勉勵。我特別要感謝謝國雄老師，過去數年多次與他討論社會學本土化的問題，他不斷強調作為

一個亞洲學者在與西方學術界對話的同時要注意與所處社會的關係。國雄的鼓勵與提醒使我不致於因為客觀環境因素的限制放棄出版《比較霸權》中文版。

黃庭康

2008年10月13日

台北南港

推薦序

教育是多層次的文化鬥爭場域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原先為日本佔領的新加坡與香港重新被英國統治。兩地都是以華人為主的英屬殖民地，新加坡有75%的人口為華人，香港華人佔總人口98%。它們的華人都設立華文學校教育華人子弟，傳遞的文化與殖民者的顯然有所不同，然而英國人卻對兩地華校採取不同的政治策略。二次世界大戰後新加坡逐步走上去殖民化、建立主權國家的進程，香港則維持英國殖民統治，雖然兩地的掌權者並未採取全面壓制華文學校的作法，而是設法加以吸納，可是香港殖民政府對華文學校有著較為包容的態度，新加坡當局對華文學校卻採取較為限制的政策。同樣的殖民統治者為何對看似相同的華文學校採取不同的處理方式？就經驗現象而言，這是個有趣的問題，這也會是一個很好的教育社會學研究課題。在這些看似相同的情境條件中，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不同的行動方式？如果你對香港與新加坡兩個前英國殖民統治的華人社會、以及華文教育感興趣，本書絕對有助你對相關現象的了解。作者處理1945年到1965年新加坡與香港的華文學校發展、華人社會文化運動、以及殖民當局的對應政策。作者對於史料的用心與細膩耙梳，讓我們清楚兩地政治文化的發展。

然而本書之為優秀的歷史研究，並不只在於紮實的史料分析，更非單純的史料羅列，而是在於作者有著深刻的教育社會學理論思考與反省。作者從國家權力形構與霸權的理論概念切入，分析兩個表面類似的統治關係與社會文化形態為何出現不同的行動方式。所謂國家權

力形構指的是統治集團致力建立或鞏固權力的鬥爭過程，在這過程中，統治者必須建構國族的或在地的身分認同，整合社會，防止社會分崩離析，對抗挑戰國家權力的敵人，並且取得民眾的支持，接受統治的關係。其中的關鍵在於統治關係的建立與維持不可能是以赤裸裸的高壓手法來展開的，用布爾迪厄的話來說，權力關係總需要建構一套象徵關係，並藉由象徵關係來運作，類似的分析概念就是葛蘭西所提的霸權概念。所謂霸權指的是統治者並非只是消滅或打壓被統治者的文化，而是對被統治者作出某程度的讓步、對其文化進行吸納改造，以取得被統治者接受統治關係。從台灣在清領、日治與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情況來看，這看似抽象的概念就非常具體呈現在我們的歷史經驗與日常生活中。在台灣社會轉型的當前，我們的教育研究者也經常援引這些理論概念探討台灣的教育現象，只可惜其中有許多分析過於平板，而理論概念的引用則失之於粗糙，甚至扭曲原意。回到本書，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如何發展一套可以充分描述並分析戰後新加坡及香港兩地的霸權、國家權力形構與華文學校之間關係的架構，並以紮實的歷史比較研究提出理論的檢討與反省。

國家權力形構與霸權的分析源自於探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其中關鍵的社會形構要素乃是階級——生產關係中的主導與受支配階級。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中，主導階級以建構國族認同來消解某些社會矛盾，讓國家權力得以運作。作者援引國家權力形構與霸權的概念分析戰後新加坡與香港兩地的華文學校教育發展，他清楚指出教育乃是涉及多層次的文化鬥爭。正因為如此，單從國家權力形構與霸權的角度切入分析兩地華文學校教育發展有其不足之處。其關鍵在於國族不同於種族。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國族認同建構並非為了解決種族的矛盾與衝突。但在新加坡與香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有著截然的種族隔離。就此而言，兩地的情境條件似乎還是類似的，然而這種類似只是表面的。其關鍵差別在於香港

除了殖民官員外幾乎是一個單一族群的華人社會，殖民政府可以吸納，甚至操控香港華人的認同，把它加以去國族化，使它不致於形成威脅殖民政權的國族身分。新加坡雖然也是以華人為主的英屬殖民地，其華人佔總人口數的75%，卻還有25%的馬來人、印度人與其他入種。重要的是新加坡乃是置身於廣大的英屬馬來亞當中。相對於大英帝國，新加坡的華人社會是被殖民者，但相對於當地的馬來人，新加坡的華人明顯是外來者。這也是新加坡與香港雖然都是英屬華人社會，其種族與種族政治的明顯不同之處。因此，作者清楚指出，除了國家權力形構與霸權這兩個層次外，在探討兩地教育做為多層次的文化鬥爭場域時必須引入種族與種族政治的概念，才可能建立一套充分的理論分析架構。

作者探討的不只是國家權力形構、霸權策略與種族政治這些結構要素。這些結構要素要影響教育政策，必須通過實際的教育行動、以及教育行動所帶來的反應。為了進一步釐清教育行動與國家權力形構、霸權策略與種族政治的關係，作者援引了伯恩斯坦教育機制的理論架構分析其關係。教育既是多層次的文化鬥爭場域，這多層次的對抗與衝突就不只出現於結構層次，更必然落實於行動、以及結構與行動的銜接中。伯恩斯坦的教育機制與教育論述理論源自於早期的符碼理論，最終發展為分析教育行動與論述的普遍理論，並試圖消解結構／行動二分的不當作法。只是其後期作品專注於如此普遍理論的開展，對許多人而言變得抽象而不夠具體。在本書中，作者不只能充分掌握伯恩斯坦的理論架構，而且能妥當操作，用以分析新加坡及香港兩地的華文教育實況，結合了結構與行動的分析，讓我們得以了解做為多層次文化鬥爭的教育場域是如何展開的，這也是閱讀本書最大的樂趣所在。

本書有著充分的史料與精采的敘事，對於喜歡故事的讀者，會帶給你莫大的閱讀樂趣。然而這些史料與精采的敘事卻是在一套深刻的

理論架構下被呈現的，對於想要思考探索問題的讀者，這是真正結合理論與經驗研究、具有反思與批判性的學術研究。然而，反思與批判些什麼？對於台灣的讀者，身處於教育體制變革、身分認同衝突、政治對抗風暴當中，閱讀本書，除了故事與學術研究之外，還有更多的聲音在你心中響起嗎？

蘇峰山

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譯序

尋找台灣教育制度變遷的源頭

身處學術象牙塔，有時候會發現自己離那套宰制我們生活的教育制度相當遙遠。「它」和我們關係密切，但對「它」卻是如此的陌生。

台灣的教育在過去十幾年經歷了許多變化，主要轉折始於1994年行政院決心推動教改並找來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擔任「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召集人，整個民間社會對此充滿高度的期待。當時教育體制受到國家過度的管制被視為是台灣教育無法與時俱進的主要禍首。一個走向民主化的社會，要求一套多元教育體系的呼聲也日益高漲，於是「鬆綁」就成為主導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核心概念。

當時教改「鬆綁」的理想把目標指向壓抑學生思考的「現代科舉」，指出聯考制度存在的不合理性，希望擴張高等教育來降低學生的升學壓力；也把對象指向國家在戒嚴體制下對教育的壓迫，教科書必須擺脫一元的意識型態，引進市場來活絡教科書的編寫；另外，也強調教育本身不再只是為了達成某些目的的工具，所以提出終身學習的美意。教改開啟了各種入學管道、師資培育、教科書、學習機會等教育體制規範的鬆綁，在一個初嚐民主的國家社會裡，沒有什麼比「去管制」（de-regulation）還要能獲得更多民眾的認同。但歷經教改十五年歲月之後，回顧這份《諮議報告書》（<http://www.sinica.edu.tw/info/edu-reform/farea2/>），改革的「良善」依舊，但是對台灣教育體系問題的批判顯然並沒有「鬆綁」。

教改所引起的爭議持續發酵，「人人可以唸大學」已經不足夢，但隨之而來的「XX（低）分唸大學」卻成為台灣所有教育工作者的「惡夢」。有心的讀者只要在搜尋引擎打上「教改」兩字，就會看到數不盡的撻伐之聲還有對教改的失望。而批判的對象大多針對主導教改的政府與當初提倡教改理念的學者以及替此政策背書的名人。為何一個意圖良善的建言或制度改革的方向，到頭來會成為許多人痛批的惡制？與其歸咎教改的成敗，不如仿效本書從歷史的角度切入，或許可以開啟另類的思辯空間，想想「台灣的教育制度為什麼會發展成現在這個樣子？」

任何制度的形成都不是單向的意志所能主導，即便是擁有強大國家能力的霸權（hegemony）也必須在主導制度變遷的過程中面對社會各股力量的挑戰，進而隨時調整自身的策略，與社會密切相關的教育制度的變遷更是如此。本書即是以新加坡及香港戰後二十年的歷史個案，將原本看似國家單方向宰制社會的教育問題細緻化，建立起國家與社會在教育問題上的動態分析。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作者如何從很繁瑣的歷史資料中劃定（locate）各個行動者在學校政治（school politics）中所處的位置，分析每一個行動者的目標與手段，並用豐富的證據來支撐這些論證。作者指出掌握權力的霸權想要透過教育完成他所希冀的國家形構計畫（state formation project），但實際落實教育的在地行動者會從中見縫插針，找到教育自主發展的空間。新加坡與香港兩地的華文教育就在國家的重組與吸納及社會的抵抗和妥協過程中形成今日的風貌。

從作者所提供的香港與新加坡的歷史經驗再回過頭來想想台灣，他所建立的分析模式對於我們找尋台灣教育制度變遷的源頭具有相當的啟發性。我們不能簡單的預設現今教育制度是國家權力展現的霸權效應，教育或許是國家公眾服務（public provision）的一環，但是所牽扯的行動者絕對是複雜多樣，唯有釐清各個行動在教育改革過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我們才能瞭解國家、社會與教育三者之間的力量在整個教育制度變遷中所產生的作用。從此反思台灣教改的經驗，才有可能具體明確的認清教育體制變遷的根本問題，也方能從中為改革下一步發展找到出路與契機。

翻譯這樣一本兼具豐富的歷史素材與專業學術理論意涵的書對我來說是一大挑戰。教育社會學並非譯者的專長，新加坡與香港兩地的歷史對我而言更是陌生，面對一個個生澀的學術專有名詞與未曾知曉的歷史事件常常讓我在鍵盤前躊躇許久。很慶幸的是我們活在一個網路時代，廣大歷史資料不再躲在陰暗的圖書館角落。更慶幸的是，本書作者黃庭康教授自己也熟悉中文，他親自替我指出了許多誤讀（譯）之處，也親自校訂了生硬的譯稿。我要感謝他的信任，他給我很多彈性與空間做這件很愉悅的工作。

李宗義

清華大學社會所博士生

英文版序

vii

過去三十多年「批判教育研究」(critical education studies)一直探討教育與不平等權力的關係。它早期的作品大都帶有濃厚的化約主義(reductionism)色彩,許多學者都假設教育是經濟力量與關係的反映、學校被外在的權力所決定。這再製取向(reproduction approach)是社會理論「一致理論」(identity theory)的其中一個分枝。經過學者多年來的批評及重建,批判教育研究早已大幅度地降低了化約主義與本質化(essentializing)色彩,取而代之的是更能掌握更複雜的矛盾關係的分析架構。受到葛蘭西理論(Gramscian approaches)、文化研究、以及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及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的影響,批判教育研究近年湧現了大量極富創意的作品。

部分有關教育與權力的優秀學術著作一直都關切國家(the state)在教育的功能,這些研究需要投入大量心力進行概念反思、歷史分析、及經驗資料的蒐集。我們要如何理解國家?國家扮演什麼角色?它受到哪些挑戰?國家內部及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矛盾關係是什麼?或許,我們可以從霸權(hegemony)理論所發展出來的概念工具入手解答這些問題。針對這一點,近年來出版的學術著作沒有一部像本書般對霸權概念做出如此細緻深入的探討。《比較霸權》的作者示範如何可以有創意地使用霸權理論剖析影響教育政治以及社會文化轉型的重要因素。他的分析超越了不少既有教育與國家研究最有影響力的作品。¹

《比較霸權》的核心是國家的概念,然而作者並沒有如許多批判取向教育研究般僅僅把國家視為一個靜態的存在物。本書所呈現的國家

不斷地回應社會運動的訴求，並持續地改變、不斷地重新形塑。通過詳盡豐富的歷史敘事，本書把動態（motions）重新注入國家與教育的分析，彌補了許多教育與權力研究的不足。

此外，本書還有許多重要的貢獻：到目前為止，大部分討論國家與教育的作品都只是有關西方國家的單個案研究（single-case studies）。這種情況是不盡令人滿意的，因為我們需要真正的比較研究。另外，我們亦必須把視野伸展至英國、瑞典等西方國家以外的歷史情境。透過「去西方中心化」（decentering the West），我們把目光專注於過去被學者忽略的歷史個案，進而可以描繪更細緻的、有關國家與學校教育關係的圖像。《比較霸權》探討新加坡及香港兩個非西方的案例，它亦是一部剖析帝國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of empire）的作品。本書將有助讀者了解帝國如何進行文化控制、殖民地的社會與文化動態（dynamics）、以及殖民地內部的社會運動如何從下而上地挑戰掌權者、並在這過程中自身出現變化。²

《比較霸權》一書的分析方法與許多既有研究極為不同，它的作者極有創意地結合國家理論及伯恩斯坦有關課程、教學法（pedagogy）、及身分認同（identity）的批判取向社會學理論。本人長期與伯恩斯坦進行對話，並引用他的理論從事研究。³在我心目中，他的作品是教育社會學領域中極有深度、極有助研究的理論文獻。《比較霸權》的作者受到這個傳統的啟發，他重塑伯恩斯坦的理論，並且以一種使讀者為之醒目（provocative）的方式應用於比較研究。結果，本書的分析跟許多以比較方法討論課程問題的著作——例如梅雅（John W. Meyer）等人的作品——同樣富有創造性（本人甚至認為《比較霸權》的創造性超過了梅雅等人的研究）。⁴此外，《比較霸權》把伯恩斯坦的傳統引領到一個新的方向。本書作者參閱的批判取向教育社會學文獻大都只把注意力放在階級、或者是現代性論述（discourses of modernity），然而他並不願意就此而滿足。《比較霸權》還幫助我們了解種族因素

的作用，它讓讀者領會到一切有關國家權力、霸權、與教育政策的跨社會研究都絕不可能忽略種族因素。⁵

我們亦可以從另一脈絡了解本書的重要性。浩根（David Hogan）曾指出教育在動員被壓迫社群，挑戰宰制團體的過程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學校體制是一套制度（institutions）、一個角力的競技場（arena）或場域（site），它可以讓對政治及文化現況不滿的社群就承認（recognition）及再分配（redistribution）的問題進行抗爭。⁶

《比較霸權》一書陳述的複雜故事顯示文化及教育抗爭往往有力地挑戰政治宰制的合法性。因此，我們不應把教育單單看成是外在權力的反映。引用本書作者的講法：「教育體系不僅僅是被國家建立（state building）過程所決定的依變項（dependant variable），學校制度有力地形塑意識、身分認同、社會分歧、及社會對抗。」因此，學校教育與國家權力形構（state formation）的關係是雙向、相互及互動的（reciprocal and interactive）。這立場重新恢復教育體系的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並顯示國家如何在建立霸權的過程中吸納及重塑文化、改變與被宰制者的關係。此外，通過研究新加坡及香港——兩個過往被忽略的歷史個案——的具體情況，本書作者批評既有理論有關教育與權力的描述，提醒讀者不要輕易地把這些理論概化（generalized）到其他的社會。對新加坡及香港具體情況的掌握又使《比較霸權》可以清楚地呈現不同的霸權策略如何在迥異的歷史條件下產生不同的政治及文化效果。

《比較霸權》還有另一特質使我留下深刻印象。到目前為止，不少批判取向的教育研究都犯有游談無根（rhetorical）的毛病，許多學者彷彿認為具體的經驗（empirical）及歷史論證都是多此一舉。因此，批判教育研究的觀點很容易被外人看成是空泛的、可以不理的政治口號。當然，新自由主義者及新保守主義者本來就對批判教育研究存有偏見，⁷然而，忽略具體論證的弊病使我們「白廢武功」，面對右派陣

營時無還手之力。《比較霸權》跟大部分批判教育研究的作品不同，它以詳盡的歷史證據呈現環繞著國家所進行的抗爭，讓讀者可以具體地體會何謂有關文化、國家、及公民社會霸權抗爭的嚴謹學術研究。在這個意義上，《比較霸權》是批判取向教育社會學最優秀的作品之一。

最後，本書作者承擔了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說的作為歷史學家與社會批判者的責任。對霍布斯邦及《比較霸權》的作者而言，他們的任務是要作為一個「專業的記憶者」，紀錄人們希望忘記的往事。⁸ 通過恢復人們對國家政策——更具體而言，國家的課程、教學、及語言政策——抗爭的記憶，《比較霸權》證明了社會運動能夠有力地建立反霸權的社會力量。此外，本書作者又展現了具體獨特的社會歷史條件在形塑社會運動的決定性作用。總括而言，本書的比較研究教導我們在進行教育與權力的批判分析時必須小心注意各個社會的特殊性。

邁克·艾普（Michael W. Apple）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
課程與教學及教育政策研究榮譽教授